

要素贡献 和我国经济增长来源识别

Factor Contribution and Origi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王林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团队项目
(项目号: NENU-SKD 2009)

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 增长来源识别

王林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来源识别/王林辉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5058 - 8570 - 7

I. 要… II. 王… III. ①生产要素 - 研究 - 中国
②经济增长 - 研究 - 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7556 号

责任编辑: 杜 鹏

责任校对: 杨晓莹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董永亨

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来源识别

王林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季蜂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8.75 印张 250000 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8570 - 7 定价: 2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一些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学术界有过广泛的讨论。诸如华盛顿共识 (Williamson, 1990) 主张宏观有序的经济政策、自由市场而非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非市场经济国家应该快速实现自由化和私有化，促进产权保护和实现经济增长。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国家，在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激进的民主化和私有化改革，即所谓的休克疗法，虽然在部分苏东地区取得较大成功，但苏联的激进改革不仅没有取得成效，经济反而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为原来的 $1/2$ 左右，贫困人口增加，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其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和持续时间之长，与 1929~1942 年的西方国家大萧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平, 2006)。为什么休克疗法失败？不同学派有着不同的解释。休克疗法效率和经济改革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其中一国经济应该如何发展，经济增长主要因素和动力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 (Rodrik, 2005)。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表明，一国经济改革成功道路可能是唯一的，但解释可能存在千万种。在这多元的解释框架中，需要特别考察一国特定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约束条件，以及经济体内众多内生要素的发展问题。Sachs (2005) 指出，经济体就如同一个生物体，有着复杂系统和个性特征，有着自身的新陈代谢过程和内在的循环机理，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的解释需要一对一的分析。因此，任何过于仓促或过于轻易地对某一国家或地区实施经济改革，以及对改革模式和

改革绩效下结论，都将可能出现谬论^①。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与苏东经济改革不同的发展模式——先经济自由化后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前苏联的改革绩效形成了强烈对比，出现了持续30多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又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内要素的发展？我国经济治理模式和经济增长效率是否存在内生决定机制？未来几十年中能否继续保持这种增长态势？对于我国经济改革模式和经济高增长的根源问题，学术界虽然一直在研究，但也存在争论。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受益于试验性和渐进性改革。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改革对某些地区或部门而言并非是渐进的，而是激进的。诸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沿海经济区的改革开放，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对于这些部门和地区而言，经济改革就并非是渐进的过程，因此，拥有相对优势资源和成熟改革条件的地区实施激进改革就是有效率的。也有学者强调，我国的经济改革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不拘泥于教条式的独特改革，是一种充分结合实际的改革，其中经济改革成功更是各级政府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周业安等，2005）。有的学者强调，我国经济增长是经济一体化作用的结果（沈坤荣等，2003）。

应该说，学术界对一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的解释有着众多的分析，但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的解释，国内外理论研究多数将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理论直接应用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无意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只关注工业化国家经济的内生生化机制问题，无法完全演绎每一具体经济形态下的经济发展机制，特别是无法深入阐述转轨经济中处于小

^① 经济增长要素决定论在关注经济增长动力和要素贡献问题时，除努力证实自身逻辑的正确性以外，往往缺乏横向对比和不同国别下经济增长的普适性问题研究。或者说，还缺乏统一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能够充分有效地解释资源禀赋和约束差异下的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问题。

农经济和二元经济结构共存的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效率问题。因此，任何直接应用一般化模型来解释转轨经济，忽视经济发展阶段性和约束条件多元性，理论研究必将存在片面性和非真实性。发展经济学指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环境下，一国经济发展规律和动力机制都将存在差异。当前文献研究更多地只是重现历史而非诠释现实，经济增长是体内要素综合持续作用的结果，要素内生性和要素发展的耦合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根源问题研究的难度。当前，我国正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巩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并指导经济改革实践，深化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和效率问题研究将更具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者

2009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文献综述和研究思路	1
第一节 文献回顾	1
第二节 文献研究的局限性	23
第三节 要素决定论前沿研究领域	32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	37
第二章 经济增长要素内生生化模型	40
第一节 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40
第二节 金融约束下的经济增长内生生化模型	44
第三节 引入制度的经济增长内生生化模型	50
第三章 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56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57
第二节 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内生生化过程	61
第三节 经济增长效率决定机制	67
第四章 我国经济增长制度因素	71
第一节 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资源禀赋约束	71
第二节 制度、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82
第三节 制度与贸易发展的关系	89

第五章 我国经济增长金融因素	102
第一节 产权约束下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	102
第二节 银行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动态相关性检验	113
第三节 证券市场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 小波分层检验和互谱分析	125
第六章 资本、劳动和中性技术进步贡献	141
第一节 主要因素指标设计	142
第二节 经济增长要素作用综合检验与评价	147
第三节 资本、劳动和中性技术进步贡献率 及动态变化特征	161
第四节 中性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	170
第七章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	175
第一节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的理论分析	175
第二节 不变质量价格指数和资本体现式 技术进步贡献	186
第三节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	201
第四节 C-M方法和资本体现式技术 进步贡献：以纺织业为例	209
第八章 地区经济增长要素贡献	226
第一节 地区要素投入	226
第二节 地区经济增长变化的特征	235
第三节 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贡献分解与评价	242
参考文献	250

第一章

文献综述和研究思路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路径和经济增长效率存在巨大差异，不仅并未出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预期的收敛趋势，而且属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更是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而经济改革特别是转轨国家的经济改革说明，一国成功的改革方式直接应用于另一国家并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随着 20 世纪后期经济发展以及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等实证方法的新进展，经济增长根源和决定要素问题正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研究领域。本章首先对国内外经济增长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其次，在总结出要素决定论局限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增长理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并提出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一节 文献回顾

自从以 Coase (1937, 1960) 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与以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就没有停止过要素贡献和经济增长根源问题的争论，特别是自 Barro (1991) 开创性地进行实证检验以来，大量的内生经济增长文献进行了内生模型演绎和计量分析，普遍指出，经济体内众多

要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正向的作用关系。但研究文献大都从生产要素视角展开,并罗列出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意识形态、政府政策和政治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清单。时至今日,理论界并没有也难以形成统一共识。

经济增长要素决定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分为四类:制度决定论、新古典内生要素决定论、金融决定论和地域决定论。

一、制度决定论^①

一国经济增长必然需要良好的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的保护,产权保护是微观经济实现有效投资和增长的前提。但产权保护有多种实现渠道,其中,政府实施产权保护具有双重性,政府既是产权保护者,同时,政府本身又是私人产权的破坏者和掠夺者。因此,在无完善制度约束下,经济发展无序或政府集权就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两面。自 Coase (1937, 1960, 1988) 的代表性成果《社会成本问题》等发表以来,制度设计就成为近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

依据 North (1981, 1990) 的定义,制度就是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游戏规则的总称,主要用于激励与约束个体和组织从事生产及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活动,对保持持续合作、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以及提高经济产出具有重要作用。Acemoglu and Johnson (2003) 认为,制度至少包含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类,经济制度又可以细分为防止政府剥削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产权制度及减少交易成本以保证合约有效实施的合约制度。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产权制度的作用往往表现得更为显著。政治制度主要是指激励和约束政治领域中个体特别是政客和政治权力精英行为的一般规则,如

^① 王林辉、董直庆等:《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的前沿文献综述》,工作论文,2008年。

董直庆、王林辉:《政治制度贡献和经济增长来源识别:一个前沿经验研究文献述评》,工作论文,2008年。

宪法和立法规则等，也直接表现为民主、专政或独裁的政府组织形

工资土地租金比率逆转不是工业革命引发技术进步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主要发生于1760~1780年间,工资土地租金比的逆转源自欧洲的对外贸易,正是欧洲的对外贸易、海上低廉的交通运输成本、自由化政策,欧洲不同国家不断缩小要素价格差距,并最终促进了1550年后欧洲经济的大发展。对于1550年西欧国家的财富大逆转问题,Acemoglu et al. (2002b)进一步研究发现,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主义是西欧国家1550年财富逆转的主要原因和重要推动力。但是,同属于大西洋贸易国,不同贸易受益国在1550~1800年间经济发展却出现了明显分化,根本原因在于大西洋贸易受益国之间初始制度禀赋的差异。诸如以法国等为代表的大西洋贸易国,真正从大西洋贸易过程中受益的是皇室集团,大西洋贸易的巨额利润促使皇室集团更加强大和国家更加垄断集权。而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非集权国家,在大西洋贸易初期就存在着大量商人,市场竞争和大西洋贸易使得商人集团更为富有。随着商人集团发展壮大,巨额财富为个体私营者保证自由贸易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深化了英国和荷兰等国家的对外贸易、市场竞争、经济自由和经济增长。若认为文化、意识形态或宗教等对经济增长起作用,只能说这些要素发展促进了大西洋贸易,而并非其后持续的经济增长。西欧兴起的根源在于初始竞争性制度安排和产权保护,其作用过程用流程图表示如下:大西洋贸易的便利条件(地域及区位优势)和非集权的初始制度安排→欧洲大西洋贸易发展→竞争程度和产权保护水平增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市场竞争、贸易发展、民间投资和经济增长→政治制度完善→经济持续再增长。不过,对于西欧经济大发展的初始冲击问题,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见解。张宇燕等(2004)认为,16世纪大量黄金白银流入西欧,初始资本的积累最终刺激了西欧的大发展。同样,对于1950~2000年韩国和朝鲜经济增长两极分化现象(2000年韩国的人均收入是16 100美元,而朝鲜为1 000美元),韩国和朝鲜政府选择了不同政治经济制度——韩国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朝鲜是社

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制度,制度差异导致之后两国经济的分化。Acemoglu et al. (2004) 认为,欧洲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与此类似,由于不同个体受益于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对于同属欧洲殖民地的国家,如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大洋洲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具有相似的经济资源和社会文化等外在约束,但不同的殖民地国家却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现象,利用如定居者死亡率和人口密度等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殖民者适宜居住和人口相对不密集地区,欧洲殖民者就越容易移植欧洲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和竞争性经济制度,建立有效地保护大多数人利用的产权制度,进而促进该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即:卫生疾病和人口密度等条件→殖民地国家殖民者的政治经济制度选择→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增长。张光南和李军(2008)利用41个英、西、葡殖民地在1970~2003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检验制度、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制度质量影响政府财政支出和政府规模进而影响产出效率,由于英属殖民地制度质量明显高于其他两类殖民地,三国殖民地经济增长分化现象明显,英属殖民地经济增长效率最高,表明不同类型制度对殖民地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或者说,制度质量不同,资本边际产出不同,导致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稳态性质出现差异(张光南,2007)。为验证政治制度贡献和增长决定因素分析,Rodrik et al. (2004)利用64、79和137个国家的数据以及模型:

$$\log y_i = \alpha_0 + \beta INS_i + \gamma INT_i + \eta GEO_i + \varepsilon_i$$

和

$$x_i = \alpha_{1j} + \alpha_{2j} SM_i + \alpha_{3j} CONST_i + \alpha_{4j} GEO_i + \varepsilon_{ij}$$

其中, y_i , INS_i , INT_i , GEO_i , SM_i , $CONST_i$ 分别表示人均经济产出、政治制度、贸易、地域、定居者死亡率、贸易进出口总额/GDP, x 表示 INS 或 INT , 通过最小二乘法 (OLS) 和广义矩估计法 (GMM) 分类检验了不同要素贡献, 结果发现: (1) 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显著, 政治制度在 GMM 方法估计下更为显著, 并且系数是 OLS 估计下的 22 倍。在控制政治制度的作用

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地域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2)贸易、政治制度和地域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政治制度对贸易和地域的作用系数高而且显著,在 Acemogle 等人(2001)的研究样本及更大的样本区间中,只有政治制度表现对人均收入、单位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解释力,即政治制度决定论在上述样本中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政治制度才是国家间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章奇和刘明兴(2005)认为,殖民地经历、资源禀赋和宗教传统等对政治制度有着关键作用,但意识形态也有决定性影响。

如果能够直接观察到一国政治制度更替即民主转轨前后的经济产出差异,对政治制度作用贡献和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解释就更具说服力。因为一国在改革前后的经济产出变化必将主要反映政治制度更替的作用效果,可以剔除众多经济体内部固定因素的影响。Rodrik and Wacziarg(2005)以已经完成民主转轨的国家为样本,利用特定时间段、民主转轨进程和政体性质将政治制度指标细化,包括民主转轨过程、新民主、集权化和新集权等(主要为5年)情况,利用 Penn World Tables 的1950~2000年数据,对比和考察民主转轨前后经济增长变化问题,得出民主转轨对人均经济产出的作为贡献是正向显著的。若按初始约束条件将样本分为低收入国家、少数民族集中的国家和非洲国家。固定效应估计显示,三组样本结果并没有出现明显差异,都突出地表现为民主转轨和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不过,民主转轨前后经济增长改善和恶化的国家都普遍存在,而且在所选择的样本中,两者发生的比例基本相当。若以不同样本组(如转轨前后经济增长发生明显变化的样本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的样本组和发生恶化的样本组)来进行固定效应实证检验,就完全可能得出民主制度和经济增长作用的关系完全相反的结论。当然,一些国家在民主转轨后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另一些国家民主转轨后经济增长却出现恶化甚至衰退,这并非就是民主转轨作用的结果。如果不进行民主转轨,该国可能会出现破坏

程度更高的经济衰退。Kaplan (2000)、Zakaria (2003) 和 Chua (2002) 强调, 发生民主化的国家经济虽然获得增长, 但并不是民主本身促进经济增长, 而只是在民主方式下经济体更易于实现市场竞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私有产权保护和防范被统治者剥夺风险, 即民主制度能够引导经济更加开放和民众政治自由, 进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可以得到类似的推论, 即: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实现民主, 只要是提高市场竞争、降低交易成本、保护私有产权和防范统治者剥削, 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也就是说, 如果一些国家由于经济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也并不完善, 直接采取激进但不具有适应性的民主转轨, 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混乱, 甚至出现更大范围的腐败和经济衰退。诸如 Roland (2000) 和 Blanchard and Shleifer (2001) 发现, 联邦制竞争模式的政体形态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诸如美国就有效, 但在俄罗斯等国的改革过程中却导致了中央和地方的冲突及经济不稳定并最终导致衰退。不过, 建立在短期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关系, 民主转轨的短期作用效应不能代表两者一定存在长期因果关系, 即民主制度是否一定是一国经济的最优制度, 转轨国家的短期历史并不能完全证明这一点 (郭明星等, 2008)。

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是否表明, 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只要是曾经出现并存续一定时间的政治制度或民主形态, 是否都一定存在效率? 回答是否定的, 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 一些国家就曾出现过劣等政治制度并得以长期持续, 甚至在今日社会中还经常发生, 这是为什么呢? Robert et al. (2006) 认为, 统治者鼓励被统治者以及一般劳动者积极开展生产和投资, 但由于分配是事后才发生,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需要克服相互间的承诺信用和社会剩余分配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即当事人双方承诺的时间和承诺兑现的时间矛盾)。由于时间和承诺的矛盾无法事前克服, 民主制度即政治制度的更替将以社会冲突方式实现。这样, 政治制度均衡就必然体现当事人间的资源禀赋和权力结构, 均衡制

度就直接反映和体现控制权主体的利益,或者说,只有当控制权主体利益与经济增长方向保持一致时,作为博弈均衡结果的政治制度才可能促进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 (2004, 2005, 2007) 认为,政治制度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社会集体选择的结果,政治权力又是政治制度演进的决定因素,政治制度内生于经济增长又反过来决定经济增长(韦森, 2002)。因此,政治制度是经济个体或组织基于其资源禀赋博弈均衡的结果,不同集团和个体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与选择偏好。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等要素的发展,促使经济个体的资源禀赋和权力结构变化,制度均衡将发生变化甚至出现社会革命以迎合不同控制权主体的利益(林毅夫, 1989)。可以说,近代欧洲经济和文明的兴起,就是在大西洋贸易中受益并且逐步壮大的商人集团和皇权利益集团博弈、斗争的结果,即经济增长根源于大西洋贸易和初始竞争性的制度安排。Fleck and Hanssen (2006) 针对古代希腊民主起源问题分析时也指出,民主制度并非来自外在因素冲击,古希腊的财富结构和投资保护制度以及不同利益集团间博弈,使古希腊民主得以产生和发展。罗必良(2008)认为,“好制度”就是指,在特定环境约束下,经济个体能够实现制度预期目标的制度安排。笔者也认同,在宏观经济领域,若政治制度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类政治制度就是一种“好而不是坏”的制度。

二、新古典要素决定论

自 19 世纪初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格局就普遍表现为较富裕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较快。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差距也正在逐步拉大,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进一步发散现象——即富国更富、穷国更穷。但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某些变化,一些原先较为贫穷的国家诸如中国、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贫困人口明显减少。是什么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又是

什么导致了贫国出现高于富国的经济增长,再次进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开始了经济增长内生生化机制的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只有进行资本积累(Romer, 1986 (a, b), 1999)、人力资本投资(Romer, 1994;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技术进步(傅晓霞等, 2006; Olsson, 2005; 赵伟等, 2005; Wu, 2003)、贸易发展和经济一体化(Yang and Borland, 1991; Sachs and Warner, 1995; Frankel and Romer, 1999; 沈坤荣、李剑, 2003; Dollar and Kraay, 2004; Kevin and Williamson, 2005)、市场竞争(Deininger, K. and L. Squire, 1998; Fordes, K., 2000; Barro. R., 2000)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实施有效的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市场化改革才能提高经济增长并促进制度发展。Sachs et al. (2004)认为,诸如非洲等贫困国家已经陷入贫穷陷阱——不仅边际资本收益率低,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率严重不足,地域环境和卫生健康条件恶劣,也缺乏足够的有效资本积累。因此,贫穷国家自身已经无法脱离贫困,只能依靠国际援助而非本身的政治或经济改革。同时, Djankov et al. (2003)认为,制度均衡有赖于人力资本和人均收入禀赋,一国政治经济和产权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制度发展更是依赖于经济增长。一国经济增长先于制度发展,制度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Lipset, 1960; Glaeser et al., 2004; Barro, 1999)。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还特别强调,资本技术决定论吻合中国和韩国等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Glaeser et al., 2004)。

针对近年来 Acemoglu et al. (2001, 2004, 2005a) 政治制度决定论观点——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质量首先需要在民主保证、协议签订、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物质或人力)资本不仅存在技术外生性,还存在政治外生性,只有存在有效产权保护的前提下,一国经济才能实现增长, Djankov et al. (2003)认为,制度均衡有赖于人力资本和人均收入禀赋,制度是人力资本发展的